

温州现象警示经济转型勿入歧途

本报评论员

今年以来,关于温州经济的负面新闻频频曝光:先是温州楼市炒作进入“最后的疯狂”,继而是温州出现实业遭遇冷落、全民参与放贷的乱象,接着是温州大量中小企业倒闭,而眼下多位温州民企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逃贷跑路的闹事,更是将温州经济的危机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从这一系列“步步惊心”的事件中不难发现,曾经备受赞誉、活力四射的“温州模式”,已经出现了一些衰败的迹象。

曾几何时,以市场化、民营化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和以大于快上为荣耀的“深圳速度”一起,同为中国改革开放所催生的两面旗帜。与这两面旗帜的辐射效应相对应的,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8%、民营企业占据中国经济总量半壁江山的巨大成就。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为了推进经济转型战略,中国政府开始主动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选择更加注重GDP内在质量、着力改善民生的发展路径,以此为标志,“深圳速度”进入“不唯快、更重质”的优化调整时期,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与此同时,或者说更早一步,“温州模式”也提出了转型升级的理念,即给分散经营、产品有限、市场单一、家族管理的“旧温州模式”

注入规模集团化、经营集团化、管理精英化、销售网络、产权现代化等新元素,使之升级为“新温州模式”。但截至目前的实践表明,“温州模式”的转型难言成功。

“温州模式”当下面临的种种尴尬,可以从四个方面找原因。首先,“温州模式”下的中小民营企业虽然善于经营、敢于打拼,但这些企业主要生产一些门槛较低的小商品,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核心竞争力不强。其次,近两年来,因为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国内外消费市场疲软、土地价格飞涨、人民币升值等原因,温州企业面临多重挤压。再次,中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一方面保住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方面也导致了“国进民退”,对民营中小企业形成排挤效应,以民营经济为依托的“温州模式”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最后,在资产泡沫的引诱下,温州企业家们迷恋赚快钱,热衷于PE(私募股权投资)、炒楼、放高利贷,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这进一步削弱了“温州模式”的竞争力。

正因为如此,温州经济近年来发展乏力,缺乏亮点,这几年公众对于温州的印象,也就是“温州炒房团”、“温州炒煤团”和“温州高利贷”而已。在实业为主打的情况下,适度从事一些投

资或投机行业,无可厚非,后者作为副业可以形成对前者的有益补充,两者共同构成多元丰富的经济形态。而在当下的温州,昔日的副业大有取代主业之势,温州的经济转型有迷失之忧。或者说,“温州模式”在“成功”地推进另外一种“转型”:从一个以实业为本、踏实致富的经济形态,转变为一个投资兴旺、浮躁逐利的经济形态。这种已然变味的经济“转型”,对于温州来说是尴尬的,因为它不是人们期待中的愿景。

温州的尴尬并非个案。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存在,只是表现的层面和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曾经的排头兵,温州经济眼下的衰象具有深刻的样本意义。它警示我们,如果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和理念坚守,美好的经济转型战略有可能只是纸上谈兵,容易在实践中走样。要言之,为确保中国经济转型能走正道,而不至于步入歧途,应该至少做到以下三点:

其一,经济转型战略固然是政府主导推进,但在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坚定奉行市场化取向,克制做“全能政府”和偏好扶持国有企业的冲动。有一个信念必须坚定不移,那就是:资源配置更加市场化和民营经济更有活力,是衡量中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的重要尺度。为

此,对一切有可能导致“国进民退”的做法要保持高度警惕。

其二,有较多淘金机会的实体经济领域,要尽可能向民营企业开放,以此形成公平竞争、竞合共赢的利益格局。在这方面,要尽快推进改革,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可以设想,如果实体经济有较好的盈利机会,类似于温州民营企业那种一窝蜂搞风险投资的风气,一定会大为淡化。

其三,要花更大的力气扩大内需。目前那种GDP增长迅猛、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更加迅猛、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缓慢的畸形格局,再也不应该维持下去了,必须大刀阔斧地予以调整。官员克制铺张浪费、降低行政开支,国企放弃垄断、让利于民,政府为民众和企业减税、返利公众,降低畸高的物流成本,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等,就是中国当下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内需若振,实业必兴;在此前提下其他产业的发展,才有源泉,才会健康。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要想成功实现转型,就是要搞好“两手抓”,一手抓“深圳速度”(它也代表了中国速度)的优化调整,一手抓“温州模式”(它也代表着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期待中国能走好这两步棋。

潇潇语歌 | Peng Xiaoxiao's Column |

落跑的股民 追不上的国家队

**彭潇潇**

今天,你炒股了吗?

今天,你还炒股吗?

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股指神游2400。纵环球市场几番凉热,道指也曾上万三,而上证综指,愣是自6124点以降,每况愈下已4载。大散也好,小散也罢,中国股民和中国股市,有着太多不得不说的故事。

有两组数据:一组来自中登公司,说的是,目前有六成股票账户处于空仓状态,超八成账户一个多月来没有任何交易;一组来自央行,说的是,调查数据表明,居民投资股市的意愿降到3年最低。

这是新闻,也是旧闻。新闻是,股民落跑了。旧闻是,股民又跑了?反正,不管跑不跑吧,低迷的成交、涣散的人气、曾经A股市场流星飞舞,如今变得牛股难觅。有人骂娘讨爹,有人反躬自省,有人呼吁救市,也有人振臂疾呼:股民莫悲观,眼前就是新牛市!

真正是股市万花筒,炎凉众生态。眼下,说不清究竟是“A股稍息,马上就回来”;还是“熊出没,请注意”……但甭管股市去年也不照样融资逾万亿,冠盖全球吗?2011年初至今,沪深两市融资逾6000亿元,平均每月发行新股25只,扩容速度也不再居全球之冠吗?来的来,往的往,有人落跑而已,何惧哉!

何况落跑的又不只是股民。何况股民好歹还有用脚投票的权利。可怜落单的纳税人,眼看着国库迅速膨胀,眼瞅着物价天天飞涨,却不知那一杯羹,自己何时才轮得上。

财政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财政收入为74286.29亿元,同比增长30.9%。据此测算,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将超过10万亿元(注)。相比之下,纳税人的工资增长就没有这么给力了。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上半年,中国CPI同比上涨5.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3.2%,不考虑被增长因素,同时扣除官方统计的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6%;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20.4%,实际增长13.7%。

如果说这是一场赛跑,比的是财富的增速,那么,国家队一马当先堪比刘翔,比城镇居民快了2倍多。

这尚且是在国内自己人和自己人比。若是放诸四海,和老外比呢?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声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 ppll18@126.com。

打击“老鼠仓”需要完善法律制度

李允峰

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近日公布了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原基金经理韩刚“老鼠仓”操作相关细节。根据公布的细节,韩刚“老鼠仓”操作涉及15只股票,其中,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公布施行后至8月21日期间,“老鼠仓”交易涉及股票14只。

完善法律制度来治理“老鼠仓”才是正途。笔者以为,要进行对“老鼠仓”行为的进一步规制,管理层不妨从《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下手。“老鼠仓”行为本来就是经济领域的犯罪,其涉及的主体主要是证券界的一般从业人员或者一些基金经理,因此,立法或修正立法时,首先考虑民事的法律制度的修改比较合理,立法的难度也不会太大,立法的条款也不会因为太专业而繁琐。但立法的程序很繁琐又要求严谨,所以,从个别条款的修订入手,是条可行的途径。

目前的《基金法》和《证券法》过于笼统,缺少可操作性,因此必须进一步健全责任的机制。因为有了具体措施的法律责任才能够得到好的实施,而这种责任的机制就是一种很有效的配套

措施。基金从业人员受委托为基金投资者管理基金,而这种责任一定要明确并且得到法律的保障。责任的机制也是监管“老鼠仓”行为的核心内容。在具体实施时,要将落实的措施落实到监管链条的所有人员,只有这样,让每一个具体的经手者都能够受到法律的监管,这种责任的机制才能够具体落到实处。

另外,就现在所发生的“老鼠仓”事件的涉案金额来看,违法所得都是比较高的。资金数额动辄上亿。“老鼠仓”违法所得的利润也是非常惊人的,因此《刑法》的刑罚规制应该严格,让那些想犯法或正在进行不法行为的从业人员们首先考虑到的是巨大的违法风险,因为害怕和担心这种风险而不敢贸然违法,不敢再为了所谓的利益而冒受刑罚的风险。

国内资本市场并不是没有法律规制,而是缺乏对法律的畏惧心。“老鼠仓”很难杜绝的原因就是,违法者不害怕、不畏罪。现阶段,资本市场应该反思,应该如何培养一种对法律和规则的敬畏之心。笔者建议,根据“老鼠仓”不同的违法情节,设定不同的法定刑,加重法定刑,增设罚金刑,可以产生刑法上的强制约束,从而加强基金公司内部监督管理的动力。

**巴菲特史无前例回购自家股票**

股神购买自家股,押宝美国能复苏。投资情绪生暖意,欧美股市有涨幅。悠悠不会得认可,增持才能换信服。别人恐惧我贪婪,如此玩酷你敢不?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当心金融危机演变成信任和信心危机

谭浩俊

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面对危机束手无策。特别是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如果没有应对危机的办法和措施、信心和勇气,危机将会变得越来越可怕,越来越难以控制。

今天的世界经济,正面临着这样的危机。而欧美发达国家在危机面前却表现得毫无还手之力。可以这样说,危机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正在由经济、金融危机向信任和信用危机转变。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解决好信任降低、信心受挫的问题,世界经济前景将十分暗淡。

信任危机首先来自于欧美发达国家在处理这场危机中的碌碌无为,甚至还在不断地给危机增加“危险源”。从当今世界经济的格局来看,面对各种经济金融问题,发达国家理所当然应当成为最重要、最积极、最有控制力的因素,发挥最关键的作用。但从危机爆发以来的情况看,发达国家明显表现得软弱无力、束手无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令世界很失望,也逐渐让世界各对发达国家处理危机

的能力和水平、态度和责任失去了信任。虽然新兴经济体国家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得非常积极、非常努力,也非常抢眼,但是,由于实力和影响有限,加之新兴经济体国家自身也遇到了通货膨胀、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受阻等方面的巨大压力,指望新兴经济体国家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显然是不现实的。要摆脱危机的困扰,让世界经济不再继续深陷下去,关键还要看发达经济体的表现,看发达经济体能否赶快走出经济低迷、债务危机的泥潭,不然,世界经济将长期低迷下去,而各种危机也随时可能出现新的爆发。那么,发达国家和发达经济体能够承担起这份责任吗?能够让世界各国和人民重拾信任吗?

信任危机的第二方面表现,来自于美元的作用和地位受到了广泛质疑。美元一直作为世界货币,美国也一直试图通过美元称霸世界经济,控制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包括欧元、日元在内的主要币种,也曾试图挑战过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实践证明,美元依靠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无法撼动。然而,危机爆发

以后,美元却一反常态,表现出从未有过的软弱和无能。而在美元的身后,贸易保护、债务危机、量化宽松等一系列与美元地位完全不对等、不协调的手段,让世界各国根本无法再对美元这一世界货币产生信任感,更别说指望美元拯救世界经济了。很难预测,到底需要多少国家、付出多少代价才能让美元重新苏醒过来。而苏醒过来的美元,到底能不能让世俗重拾信任,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信任危机的第三方面表现,则来自于对国际经济组织能力和实力的不信任。进入工业化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世界经济组织,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解决贫穷问题、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化解世界经济矛盾等等。然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这些世界经济组织的作用明显不足、实力明显不够、号召力明显不强,以至于世界各国不得不对这些世界经济组织的救援和化解矛盾能力产生质疑和不信任。相同的还有世界贸易组织,面对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行为,似乎显得毫无办法。如此境况,国

际经济组织应对危机的能力还能获得多大的信任度呢?

信任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信心危机的发生。因为,不仅市场信心严重受挫,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对危机的信心也严重不足。可以这样说,市场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已经降到了历史低点,且呈继续加速降低的态势。目前的市场已经不起任何一点风吹草动,全球股市、石油、金属市场等都呈现出下跌的态势,且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由于市场形势的急剧恶化,导致各国在政策取向上也变得更加难以把握和协调。这不仅来自于欧美发达经济体国家,也来自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化解危机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小。

如果说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由于中国充分发挥了地区政治领导力的作用,没有让这场危机演变成信任和信心危机,最终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危机。那么,今天的美国以及发达经济体国家,是否也愿意象当年的中国一样,发挥政治领导力作用呢?是否舍得作出一点牺牲,让经济尽快走出困境呢?我们拭目以待。